



（上接3版）
我简单讲几个习近平同志在他的“两山理论”形成阶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例。

一是治理长汀水土流失。1999年11月27日，时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赴福建西南部红壤区，在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长汀县进行考察。在长汀石灰岭，当地群众为纪念原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建造了“项公亭”，习近平同志远眺连绵起伏、红土裸露的山头，神情变得十分凝重。他对身边的干部群众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污染环境就没有道理，破坏生态和浪费资源的‘发展’就是歪道理。”听完长汀县委负责人工作汇报后，习近平同志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项南老书记的关怀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2000年5月29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得知长汀正在建设生态园，专程托人送来了1000元，捐种一棵纪念树。2001年10月13日，他又一次来到长汀，为他捐种的香樟树培土浇水。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认真听取了长汀两年来水土流失治理的情况，他始终关注和支撑着长汀水土流失的治理工程，对每一个数字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要求，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2000年迄今，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长汀将治理水土流失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常抓不懈，每年投入专项资金1000万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上升至79.8%；当年的国家级贫困县，现在农民的收入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地科学治理，昔日万万亩山地上坡上新绿；许多断流的小河重现水声潺潺，久违的白鹭也飞回来了。如今，习近平同志当年在长汀捐种的那棵香樟树格外枝繁叶茂、特别生机盎然，这也象征着他所推进的生态环境建设硕果累累。

二是大力推进全省林权制度改革。习近平同志那时候明确提出，集体林权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这项改革意义非常重大，后来很多学者评价为是“继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革命”。从根源上说，森林是福建最大的优势之一，森林多了，就可以调节空气、涵养水分、优化生态环境，也可以增加老百姓收入，所以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保持和发展这个优势。2001年，习近平同志一锤定音，推动了福建省林权制度改革工作，这项改革极大调动了林农种林、护林、用林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林权制度改革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3年以来，福建省森林资源不断增加，森林覆盖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三是城市湖泊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当年污染严重的厦门筼筹湖及福州西湖的污染治理，都是在习近平同志重视关心和主持下启动的。历经几届政府和大众群策群力，采用截污、清淤、补水的科学方法，湖泊治理取得圆满成功。昔日污染严重、令人望而却步的筼筹湖，生态环境有待提升的西湖，如今已成为厦门和福州亮丽的风景名片，成为市民休闲、游览的好去处，被群众赞誉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好的诠释。

四是治理“餐桌污染”取得良好成效。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他积极开展基层调研，通过充分收集群众反映，了解到食品安全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据此要求在全省上下开展治理“餐桌污染”和严查“瘦肉精”专项工作，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安。这项工作在全国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采访组：请您回顾一下习近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制定和实施的具体过程。

李在明：2000年底，“一控双达标”的艰巨任务圆满完成以后，我们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习近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制定长远的生态环境战略规划。他给我们讲，推动这方面工作一定要先搞调查研究，要在具体实践中寻求解

决的政策和措施，这样工作才能真正产生可持续的实际效果。习近平同志当时要求我们用一年时间搞调查研究，把生态省建设各方面的问题摸清楚。用这么长时间搞调研，也可以看出他严谨的工作态度，从没有急功近利走过场的想法。习近平同志深知《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制定，涉及方方面面，关系全省社会经济发展大局，这项工作光靠省环保局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需统筹考虑、多方协作才会有效果。当时，他安排了省计委牵头制定，省环保局和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素材，一方面做调查研究，一方面搞课题研究。为制定好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习近平同志还提议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亲自任组长，承担最大的责任。这个小组成员，包括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办公厅及省直有关厅局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环保局。大家做了很多调研工作，也研究了很多省内外、国内外的典型案例。

在启动初期，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生态省建设，首先思想要通，理念要新，措施要实，立足实际，着眼未来，这样工作开展起来才会比较顺利。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不仅要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问题，更要从全局战略的高度来看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所要求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有很强的科学性，不仅时空跨度大，而且和经济发展结合得非常紧密，充分为长期的发展考虑。就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没有哪个省长会在一个地方干20年，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当时所做的规划，完全是为福建的未来考虑，为子孙后代考虑，为可持续发展考虑，而不是为他自己任内的短期看得见的“政绩”去考虑。

2002年5月，我们完成了总体规划纲要第6稿的修改工作，省环保局随即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之后，他就开始筹备全省环保大会来推动生态省建设的实施。这个大会至关重要，习近平同志决定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他一贯很反对开那种言之无物的会议，要求会议一定要开得有成效。他对我说：“生态省建设中有很多政策、措施、方法要研究，这需要请国家环保总局进行指导和支持，所以你们和国家环保总局联系一下，向他们提两个请求。第一，我们省委、省政府拟于2002年7月3日召开旨在全省推动生态省建设的环保大会，届时请解振华局长参加这个大会，并请他在大会上讲话。第二，我们的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送审稿，还要请国家环保总局审核把关并邀请国内权威的生态环境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和两院院士一起来参加论证。这样，我们制定出来的规划纲要才更有科学性、权威性和可行性，实施起来也会更有把握。”

2002年6月初，我去了北京，找到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按照习近平同志的嘱托向他汇报并说明了情况。解振华局长毫不犹豫地点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并且马上着手召集有关专家和院士分头审阅《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以及筹备赴闽开会事宜。解振华局长如此支持我们，是有原因的。他对我讲，福建开展生态省建设的条件是非常好的。第一，省委、省政府对生态省建设高度重视。特别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组织、领导、推进生态省建设。第二，福建省连续多年的森林覆盖率都位列全国第一，空气、水环境优良率也排在全国前列。而且福建在区位和地理上有优势，省内“五江二溪”主要流域都在自己的区域内自成水系，达标率高，不存在外省污染的问题。第三，由于历史上是“前线”的缘故，福建省的大型污染企业比较少。第四，省环保局领导班子团结有力，环保系统上下协调，政令畅通，组织纪律性强，这是实施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保证。

2002年7月3日，全省环保大会如期召开。这是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大会，规格很高，人大、政协和省直机关有关领导都来了，全省各个设区市的市长、分管的副市长、环保局长也来了，各个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的领导及环保局长也都来了。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宋德福同志、省长习近平同志、国家

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三位领导当时都是一把手，都讲了话。习近平同志作了《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争创协调发展新优势》的主旨报告。在讲话中，他把福建生态省建设中的目标、要求、任务、步骤、阶段，都讲得清清楚楚。他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就是经过20年努力奋斗，把福建建设成为生态效益型经济发达、城乡人居环境优美舒适、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全面优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省份。习近平同志还强调生态省建设“要有成效”，就是不要有水分，要实，要管用，政策、措施要讲求实效。在这次大会上，大家还认真讨论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实行环保工作述职考核的决定》，这两份文件发给全省县、市、区的党政部门，文件中有不少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强调对生态环境工作责任要列入各级党政部门政绩考核的内容，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进行审计，要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大会还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长环保目标责任书（2001—2005年）的通知》，现场由习近平省长和全省九个设区市的市长签订了《市长环保目标责任书》；大会后各设区市也参照省里做法，召开了全市环保大会，市长也和辖区内的县（市、区）长签订了环保目标责任书。这次大会在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效果非常好。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的要求都逐步得到了落实。

大会期间，我们再次和解振华局长商讨落实接下来年的《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修改稿）论证会事宜，涉及了论证会怎么开、在哪里开、谁参加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建议：“我们去北京开，这样国家环保总局好安排工作，也可以少增加两院院士的麻烦；会务工作，我们和国家环保总局一起做。”解振华局长完全同意习近平同志的意见。

2002年8月25日，论证会如期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同志亲自带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及有关厅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论证会，我们和省内外专家、院士们都去了。解振华局长亲自带领有关司长全程参加了会议。论证会期间，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领导跟我讲：“你们的习近平省长对环保工作这么重视，还亲自主持论证会并发表很有见地的意见，使我们很感动；你们省这么重视生态省建设，也给其他省带了一个好头。”这次论证会，共有17位国内知名专家参加，其中有8位是两院院士，他们对《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给予了总体上的肯定，同时也就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规划纲要进行了修改充实。这项工作卓有成效。纲要正式颁发后，各方面的反响都很好。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2003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根据生物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度、土地退化、环境质量等指标对外发布的“2002年全国环境状况综合评价指数”，福建省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质量名列全国第一，但我们对外都只讲“名列前茅”。福建的生态环保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的为民情怀和狠抓落实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前后，你们都有哪些交流？

李在明：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即将离开福建赴浙江任职前，他通知我到他办公室见面。首先，他表达了对福建的眷恋不舍，谈了服从党中央的安排，以及和浙江方面工作交接的进展情况。接着问我：“浙江现在提‘绿色浙江’，你怎么看？”我建议说：“我认为应该和国家提出的‘生态省’建设口径一致比较好！”那天，他还嘱咐我要继续搞好福建的生态省建设。我们聊了近一小时后，他说：“在明，我们照个相留念吧！”在合影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很亲切地拉着我的手，照了张相。我当时心里很高兴，但是一想到他一离开福建，我

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又觉得很不舍。他对我说：“你以后有机会到浙江，就来见见我。”我很感动，答应“一定！一定！”但我也深知他到浙江以后工作会更加忙了，也就没有去打扰他。

2004年，浙江省和国家环保总局在杭州联合召开“全国生态省建设论坛”，我陪同福建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参加论坛。当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他全程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那天晚餐后，我和习近平同志在宾馆门口聊了十来分钟。我对他说：“您离开的这两三年，大家都很想念您，请您有机会一定回福建走一走，和大家见见面。”他愉快地答应了我。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相信您也一直关注着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方方面面的措施，关注着我们国家的巨大变化。

李在明：是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经常跟我的亲朋好友讲：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感情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加上“感情上”，不仅是私人的感情，更是革命的感情，是人民对总书记的感情。退休后，我已经形成一个习惯：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哪怕有事错过了，也要补看。我从电视上能看到习近平同志，也能了解到一些时政的情况，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不少人说：习近平总书记太辛苦了，太累了。出国访问，乘坐飞机要那么长时间，到异国他乡，连时差可能都还没倒过来，就马上参加国事活动。他的勤政为国、真心为民的精神，令人深受感动。

这些年来，由于曾经从事环保工作关系，我特别关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情况。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我注意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大漠戈壁到江南水乡，习近平总书记每赴各地考察调研，几乎都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和明确要求。在考察调研中，在各种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比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等等。听到这些理念，联想到他在福建工作时讲的一些话、推动的一系列工作，感到是那样的亲切。

我们都看到了，这些年来我们党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新局面已经开启。

我欣喜地看到，2018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会议的最大亮点是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相信，今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绿色发展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中华大地一定会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美好。

采访组：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和工作风格一定会有深入的认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在明：我有幸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几年，接受他具体的工作指导，亲身感受到他的领导风范，因而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风格有着进一步的认识。我感触比较深的有这么五条：

一是注重调研、善于规划的工作风格。

习近平总书记对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举措，都会先摸清情况，在调研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对重大事情更会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长远的规划。比如当年的《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带领我们用一年多时间搞调研后才形成的，这是我亲身感受的其中一例。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如反腐倡廉、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带一路”倡议等等，都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战略规划。纵观习近平总书记的从政经历，我不仅感受到他实事求是和问计于群众、求知于实践的根本工作方法，还从更深层次感觉到他对长远规划的重视。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一以贯之的工作风格。

二是狠抓落实，“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工作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工作历来是非常实在的，他善于规划、注重落实，从不急功近利。他曾说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他在福建工作时就非常注重规划和工作持久的落实，不搞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他要求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要言行一致，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规划蓝图。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负责的使命感。

三是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一起生活过，与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了解人民群众在想什么，所以他接地气、有底气。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我们能够从他工作的点点滴滴看出他执政为民的理念。他认准的事一定会抓紧、抓实、抓到底。他在福建工作时经常和我们说：“不要忘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道出了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执政之本，所以他能够始终如一地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对人民的感情，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是他鞠躬尽瘁工作的动力源泉。

四是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站得高，看得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办的几件大事都非常具有前瞻性，具有远大的战略思维，既有放眼全国的高度，又有胸怀世界的宽度，同时又非常切合我们当前的实际。我想，这是因为他在基层工作过，充分了解基层，他从大队支书、县委书记、副市长、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中央领导，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对基层工作的整个结构、组织、具体运转既有微观认识，也有宏观了解。再加上他从年轻时开始，就善于学习，勤于思考，造就了他科学缜密的思维能力。所以，很多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形成他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

五是审时度势的政治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有着超群的政治定力。他在福建工作的时候，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困难，特别是他担任省长的时候，厦门“远华案”严重影响了福建的形象。当时政治生态欠佳，经济发展艰辛，财政也遇到很大困难，厅局级以上的干部被查处了不少，甚至某些地区和系统的领导干部大面积“沦陷”。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习近平同志还是能够镇定自若，力挽狂澜，全力掌控局面。在他的努力下，各项工作很快又进入了正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在中国不断崛起的同时，一些看着我们不顺眼的国家和势力在不断搅局，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很有政治定力，用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真诚待人的人格魅力，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创了新时代大国外交的新局面，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途国家的响应；比如南海争端妥善的化解；比如对菲律宾、东盟、美国的外交关系处理等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确是一位审时度势、稳健睿智的大国领袖。

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区是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基础的防线，是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凝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疫为鉴，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产权单位、房地产中介机构、餐饮企业、连锁药店、律师事务所、民办医院等驻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都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必须尊重其主体地位、找准利益结合点、调动参与积极性，形成联合作战、整体建设、系统集成的社区治理局面。北京市朝阳区住宅物业服务企业共开展消杀近百万次，配合街乡社区走访近50万次，有效弥补了防疫工作力量不足，在保障群众生活物资、引导科学防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链家集团党委深化社区好邻居共建项目，以党员为主体成立社区防控突击队，为社区居民提供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超过500家门店变身线上购物代收点，经纪人伙伴站岗执勤超过3000人次，为社区老人和隔离人员送菜上门、代送快递、清理垃圾1800余次，各大区、门店向社区捐赠物资和慰问品200余次。朝阳区行业党委选派精干力量组建三大法律服务团，安排1139名律师为社区防疫提供在线服务，截至5月中旬累计服务时长1120小时，涉及争议金额4000余万元，服务企业43家，化解纠纷8次，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中优化社区治理

□ 谷昆鹏

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重要法律支持和专业服务。

理顺治理主体责任关系。明确权责边界，是各类治理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基础，其核心之处在于法治保障。党章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这就明确了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同时，要强化依法治理，更加注重社区治理政策设计的系统性，确保法律法规有机衔接、协同发力，使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地位通过法定程序得以体现和落实。在社区防疫实践中，众多物业服务企业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但实际上物业服务合同并没有明确其防疫责任，原先涉及物业服务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物业服务人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的法律关系。《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首次在地方法规中明确“构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框架下的物业管理体系”，将业主委员会、物

业服务人纳入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治理体系，为社区党组织依法履职奠定基础。

夯实一核多元组织架构。搭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架构，把党的治理有效延伸到各类社区基层组织，将社区党组织的主张转化为各类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激活神经网络末梢。推动支部建在小区、楼院内，通过科学划网、全力织网、协同强网、服务入网、保障优网，构建边界清晰、覆盖全面、管理灵活的网格体系，将防线前移到网格这个最小的组织单元和战斗堡垒，使各项防控措施精准落实到社、院、门、楼、层、户、人。亚运村街道安慧里社区探索构建“五纵五横”的党建网格体系，在纵向上明确街道工委、社区党委、居民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五级的责任链条，在横向上把五个居民党支部分别建在实体网络上，网格内统一实行社区工作小队、志愿者团队、服务小组“1+1+1”工作机制，白天去敲门、晚上看亮灯，整个社区仅用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轮的门栋行动。持续扩大

落实街巷长、小巷管家9519名，通过走动式工作法、走动联、三进三民、网络问政等方式，广泛利用社区创享计划、支部和楼门会、提案大赛等载体，征集居民意见建议，实行清单管理，把常态化防控下的居民需求摸清摸准。健全联动协商机制。以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社区党群群共商共治会、社区居民议事厅等平台为依托，把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社区自治组织、驻区两新组织等主体纳入其中，由社区党委牵头开展共商共治，有效整合资源力量，形成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工作体系。目前，全区已经建立党政群共商共治平台500多个，各级议事代表1.9万多名。自2014年以来，通过实施党群共商共治工程，统筹会商解决各类民生实事项目4100多个。完善服务评价机制。坚持完善问需、问计、问效“三问工作法”，赋予社区党委更多的参与权和评价权，确保问题找得准、有人参与、办得好。2019年10月，朝阳区物业管理协会牵头对全区280个物业项目组织开展服务评价工作，按照业主、第三方机构、所服务的街乡和社区三类主体，从业主满意度、房屋设施设备管理、园区环境管理服务、街乡社区、专业部门五个维度，突出社区党组织的评价权重，最终评选出5A级（14家）和4A级（21家）项目共35家物业项目品牌榜，发挥了社区党组织在行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组织部副部长）